

站在人口科学理论思维的前沿

——访邬沧萍教授

姚 远

【人物简介】 邬沧萍 1922年9月生于广东番禺。1946年毕业于香港广州岭南大学经济系，曾在香港中国九龙海关任职。1948年赴美在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1950年取得MBA学位。为响应新中国的呼唤，1951年离美回国，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71年以前，在统计系任教。1971年以后，在人口研究所从事人口学翻译、教学和研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老年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府参事，曾任第七、八两届全国政协常委，国际人口研究机构联合会常务理事、国际老年学学会亚太分会常务理事等。1995年获第二届中华人口奖(科学奖)。2000年获经教育部批准的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奖。

他独著、合著、翻译、主编、副主编的专著、教科书、译著、工具书有20多种，公开发表的论文300多篇。其中，部分著作和论文曾分别获得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国家计生委优秀成果奖、中国人口学会优秀成果奖、北京市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等。主要代表作有：《社会老年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总报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世界人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人口非控制不可》(《人民日报》，1979年2月)、《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人口研究》，1980年第3期)、《老年学的形成、研究对象和科学性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健康老龄化”战略刍议》(《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稳定低生育水平——一个惠及子孙万代的重要战略决策》(《求是》，2000年第20期)等。

姚远(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从您的经历来看，您很早就涉足经济学和统计学，还在美国获得了MBA学位，这些都是现在令人羡慕的热门专业。可是您却放弃了这些，而几十年来一直从事比较冷门的人口学和老年学研究。对此，您是如何考虑的？

邬沧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思考。一是个人的价值问题。我认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以个人利益获得的多少为标准，而主要看你为社会贡献了多少。在国家需要进行人口学和老年学研究的时候，我能够服从学校安排，投身于人口学和老年学研究，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点

微薄力量，我觉得很值得。二是人口科学的前途问题。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人口科学，离不开人口科学。所以，人口学是一门大有前途的科学。问题是，人口科学的重要性现在尚未被充分认识，还需要藉以时日。为人口学事业的发展，努力一生，我无怨无悔。三是我从经济学和统计学研究转向人口学研究，驾轻就熟，很轻松。我读过MBA，系统学习过经济学理论，又读过《人口统计学》，并从1972年开始翻译和阅读联合国人口文件，所以，知识结构和研究基础都使我能够很快进入和胜任人口学研究。

姚：从20世纪70年代算起，我国当代人口学的发展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时间。作为最早

涉足人口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您的研究涉及了人口理论、人口统计、世界人口、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社会老年学等诸多领域。那么,从人口学建设角度来说,您始终关注或说您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邬:人口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人口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也有自己的学科体系,但是,人口学又离不开其他学科的支持,比如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人类学、生物学、环境学、地理学、医学,等等。从人口学发展历史来看,人口学学科体系建设始终是人口学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人口学学科体系建设问题,一方面关系到我国社科体系的建设。没有人口学学科,我国社科体系就不完整,也会影响到其他社科学科的深入发展。一方面关系到社科整体上认识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社会问题是复杂的,认识和解决任何现实社会问题,都需要多学科的视角。很难想像,在没有人口学学科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对人口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城市问题乃至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做出科学的认识。另外,从人口学角度来说,人口学学科体系使人口学知识理论化、系统化、基础化,增强了运用人口学知识解决人口问题的能力。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总结,我们怎么能这么快接受控制人口的思想?如果没有对先进的人口统计和分析技术的引进,我们又怎么能对中国人口问题有一个准确的量化认识?

从历史角度来看,人口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概念奠定于1884年。在这一年举行的日内瓦国际卫生学和人口学大会上,会议决定将Demography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口学学科才最终成熟并长足发展。促成人口学学科成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人口实践的需要。“二战”以后,世界人口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迫切需要理论总结。第二,政府行为的推动。人口问题引起各国政府的关注,加大对人口问题的研究。第三,每10年一次的世界人口普查。第四,进行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次人类社会科学调查——WFS(世界生育率调查)。第五,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财政、技术支

持。第六,人口学总结“二战”后大量科研成果的成熟著作的出版。第七,人口学的普及。第八,学术活动。可见,人口学学科发展是实践需要、政府推动、活动开展、著作出版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学科角度来看,人口学主要研究人口各个变量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各种变量的数量方面(规模、速度、比例)以及各种变量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人口各个变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间的相互关系。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Demography + Population Studies。前者强调人口内在变量,旨在认识世界,回答是什么;后者强调人口内在变量与外在变量的关系,旨在改造世界,回答为什么和如何改造等问题。任何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要借助其他成熟学科的力量。人口学学科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统计计算,二是经济学。统计计算在探索过程中提供了方法,经济学提供了理论。随着人口学学科的发展,社会学、数学、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逐渐为人口学所借鉴,使人口学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正是由于上述背景,人口学具有独立学科、新兴学科的特点。所谓独立学科,是说人口学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而新兴学科,是说人口学的历史并不长,从其重要性和研究的深度来讲,人口学还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当代人口学是伴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而发展起来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多实用性的色彩。我之所以强调人口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是因为人口学不等于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仅仅是我国人口学中关于生育和人口增减的部分,属于实践部分的一个分支。另外,人口学学科建设代表了对人口问题的一种整体的综合性思维,它与社会学、经济学、环境学等学科一样,从不同角度思考整个人类正在面临和将要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局限于一个具体的方面。

姚:您谈到人口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可是,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人口学本科专业已经被取消了。对这个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邬: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我认为学科建设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研究的任务,对现实人口问题提供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对当前的人口决策提供智力知识,提供论据和观点,使我们对自己国家的人口问题有一个符合实际的认识,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对策体系。二是培养专业人才的任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要有。这两个任务是相辅相成的。人口学研究离不开对人才的培养,一是教学推动研究,二是研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有赖于“长江后浪推前浪”。人才培养也离不开人口学研究,人口学研究越深入,培养的人才水平也越高。但是,两者又有区别,具有不同的属性。如果说人口学研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比如,基础性研究、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等)超脱于市场需要的话,那么,人才培养就要密切结合市场需要。因为,毕业生需要就业。从目前的情况看,就业市场对人口学本科学生的需求是有限的(当然,这种需求的有限性也有人为的因素),所以,教育部决定不再培养人口学本科学生,加大对人口学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但是,我国有近13亿人口,直接从事人口统计、计划生育的干部不下二三十万。一年培养20个左右的本科生是否就过剩?还是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

另外,停招人口学本科生是否意味着人口学学科不再有前途了,我不这么看。我在前面讲过,决定一个学科生命力的不是相关研究人员的多少,而是社会实践的需要。从我国情况来看,社会实践是发展的、分阶段的,一个学科的生命力也是发展的、分阶段的。在20世纪后半期,我国人口学主要是为控制人口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21世纪以后,我国已经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人口学一方面要继续提供对策性理论支持,开展前瞻性研究,另一方面或者说更多的方面是要深入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无论是研究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地理问题,都需要对人口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都需要人口学的知识。现在比较热的人力资源问题、公共管理问题、城市建设问题等,实际上都是人口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的结果。可以说,

21世纪以前,我国人口学处于对策性研究阶段,其作用是有限的,而在21世纪以后,人口学才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学研究阶段,人口学的理论、方法、观点将会为越来越多的学科所吸纳。从国际情况来看,21世纪全球人口问题十分复杂。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人口问题都充分暴露。生育率开始持续下降,人口持续惯性增长,人口迅速城镇化,发达国家老龄化、高龄化,人口减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国际移民问题等都迫切需要人口科学回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

姚:在我认真地拜读了您的所有人口学方面的论文以后,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您的思维始终是超前的,始终处于人口学研究的前沿。比如,当人们关注控制人口对策问题时,您已经指出控制人口与发展经济并举;当人们关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时,您又提出人均的概念;当人们关注降低生育率问题时,您已经系统地谈到了人口老龄化的必然性。您能否具体谈谈这些观点?比如,这些观点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对我国人口学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邬:这个提法需要修正一下。任何一种观点的提出都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新的认识和总结。也就是说,新观点可能是某个人首先提出来的,但其基础却是集大成的结果。回顾30年的历史,大致形成了以下的一些观点。

其一,人口国情论。人口众多是中国最突出的国情,但对人口众多问题的认识却经历了百年的历程。远的不说,仅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就在“要不要控制人口”的问题上发生过认识上的反复。我的同事查瑞传教授主编的《人口学百年》一书清楚地描述了这种情况。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蓬勃开展,人口问题越来越引起国家的关注。人口多、资源少和底子薄构成了我国经济腾飞的巨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我国的人口问题和将人口问题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什么位置上,确实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经过深入的研究和总结,最终形成了人口国情论的思想。在写给北京市市委的国情报告中,我们认为,人口众

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个国情将会对我国现代化产生影响。我国的重大国策无一不与人口众多相联系并成为一个出发点。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的后果不仅表现在吃饭、就业等经济方面,而且影响到社会安定团结、青少年教育、家务劳动社会化直到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社会、政治、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从现在的认识看,还直接影响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口国情论的基本价值在于为我国控制人口政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系统地阐释了人口问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其二,人均观念。对现在的人来说,人均观念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发展速度不快时,人口分母影响就很大。当 GNP 是主要的统计指标的时候,人均观念的提出就具有一种重要的意义。人口众多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口的“分母效应”。人均财富、人均自然资源、人均社会指标都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水平。同时,人均指标也是考察两种生产是否相适应的一个比较好的指标。在 1987 年 7 月 11 日的《人民日报》上,我们发表文章提出人均观念,其意义在于强调人口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控制人口在我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现在速度发展快了,分母效应影响就不大了,就认为人口无关宏旨,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其三,人口数量辩证论。对人口数量的看法是人口学的基本内容。百年间有关人口问题的争论,也主要集中在人口数量方面。我们认为,第一,既有的人口状况是不能选择的,只能正确认识,因势利导。一方面要发挥人多的优势,充分利用人多的能动性和相互间的影响力,实现我国既定的目标;另一方面要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第二,人多相对的,不能形成悲观的无所作为的论调。人多具有政治方面的优势,也具有经济方面(比如,规模效益、市场效益等)的优势。人多,回旋余地大,人多如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就能够办大事,抵御灾害的能力也高。

其四,控制人口的思想。为计划生育实践服务是我国人口学的特色之一。从 20 世纪 70 年

代起,人口学的专家们就为计划生育工作献计献策,提供理论的和技术的支 持。几十年来,我们提出的思想大致有这样一些方面:第一,主张严格控制人口,但又要防止“过犹不及”。第二,在《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中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坚决杜绝生三个。第三,在 1987 年云南会议上,坚持真理,反对人口地区规划和 6~7 亿的所谓理想人口规模的主张。第四,1985 年提出,人口减少应持谨慎态度。第五,重视妇女生殖健康,很早就提出“计划生育,丈夫有责”、“计划生育,男人也是半边天”的观点。第六,对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进行理论解释。第七,关于稳定低生育水平问题的研究。

其五,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思想。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问题的重要性。但在当时,很多学者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我们组织的第一次全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研讨会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到会的不少是自然科学界的教授专家。最早的有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1985 年出版的《人口理论教程》中。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不只是谈人口与资源环境两个变量间的关系,更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两者协调发展的机制。在研究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努力建设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提出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关系史研究。

姚:《中华英才》杂志将您称为“中国老年学研究第一人”。我想,这个称号大概有两个含义。一是您在老年学领域里硕果累累,很多思想和观点都是您提出的;二是您是我国最早关注老龄问题的学者。您能不能具体谈谈您是如何想到要研究老龄问题的?

邬: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变化都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的是与其他事物相互关联的,孤立的无联系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控制人口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统计学角度看,人口老龄化是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而形成的。少儿人口比例下降可以形成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也可以形成人口老龄化。所谓年龄金字塔的顶部老龄化与底部老龄化。控制人口增长将会导致少儿人口数量的减少和少

儿人口比例的下降,所以伴随着控制人口增长的深入进行,人口老龄化问题迟早会出现在中国。我从1979年开始关注老龄问题。1982年我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就开始指导硕士生写人口老龄化方面的硕士论文。世界老龄大会在维也纳的召开,我注意到国内外的人口数字和老龄情况。我意识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潜在因素已经出现,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应该提上议事日程。1984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老龄问题和我们的对策》一文,并在我国第一次国际老年学讨论会上发表《我国计划生育与老龄问题相辅相成》的论文,正式提出全社会要关注老龄问题,并指出老龄工作是政府的职能。其后,我一方面加强对老龄问题的研究,撰写了大量的老年学方面的论文,一方面努力呼吁成立老龄研究机构和老年学专业,培养了一些从事老年学研究的博士生和硕士生。

姚:您主编的《社会老年学》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还获得了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这部书里,您汇总了曾经提出过的一系列新的观点。比如,社会老年学的命名、健康老龄化与健康的老龄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战略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思想之一是健康老龄化。您能否谈谈健康老龄化思想提出的过程及其在解决我国老龄问题中的意义。

邬: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各国都在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法。其中,由世界卫生组织首倡的“健康老龄化”最引人注目。其原因在于健康老龄化口号的提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1987年,世界卫生大会决定将“健康老龄化的决定因素”作为主要研究课题;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哥本哈根世界老龄大会上把“健康老龄化”作为对付人口老龄化的一项发展战略;1993年,第15届国际老年学学会布达佩斯大会把“科学要为健康的老龄化服务”作为会议的主题。另外,健康老龄化理论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普遍性。健康老龄化从医疗保健和老龄化过程中的老年人健康问题着眼,将重点放在提高大多数老年人生命质量,缩短生命带病期,使老年人以正常的功能健康地存活到生命的终点。这样的提法无疑更具有

号召力,在实践上也更具有现实意义,更容易为大多数老年人和社会各个年龄组的人群所接受。

有学者认为,健康老龄化只适合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因为发达国家大多数老年人都已经解决了物质生活问题,健康问题自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第一,物质生活水平与健康需求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对健康的需求,都是相对而言的。第二,健康老龄化不仅仅是一个医疗保健目标,更是一项社会战略。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同样需要健康老龄化,健康老龄化也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对策和思路。

由于健康老龄化在解决老龄问题方面的重要意义,我在布达佩斯会议以后回国就立即进行传达宣传。首先在北京市组织了一个地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会议,彭珉云同志出席。接着组织了一次健康老龄化论文征文,来稿有1000多篇。在此基础上,召开了一次健康老龄化学术研讨会,将健康老龄化思想推向全国。同时,我充分利用各种演讲、会议发言的机会广泛宣传健康老龄化思想。当然,我也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人口研究》等重要报刊杂志上撰文,力求使健康老龄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在引入健康老龄化概念的时候,我们力求健康老龄化与中国老龄问题实践相结合,适合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实需要。当西方国家将健康老龄化视为一种个体老年人健康保健目标的时候,我们则从社会战略的角度强调健康老龄化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说,第一,健康老龄化关注老年人口中大多数人的健康长寿,强调总人口中健康老年人比重的不断提高。健康老龄化的着眼点是社会群体的健康长寿,而不局限于少数长寿老年人的增加。因此,健康老龄化既关注老年人的健康,更关注老年群体的健康;既关注老年群体的健康,更关注整体人口的健康。只有全民健康水平提高了,老年人的健康长寿才能实现。第二,老年人的健康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生活的完善状态对老年人的生活具

有重要意义。传统意义上的健康主要强调生理功能的健全和生理机能的正常发展,而现代意义上的健康则从生理、心理和社会多角度、综合性地探讨健康的机制,认为健康是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全的安宁状态,并以此作为衡量健康状态的一般标准。因此,在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时,既要发展老年医疗保健,也要加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还要重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减少对老年人身心健康不利的社会影响。第三,健康老龄化是老龄化时代社会良性运行的标志,也是人类对付过度老龄化的一项有效乐观的对策。由于老年群体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参与社会能力的加强,老年人自强自立自助,能动地减少对社会和家庭的依赖,实现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同时也会最大限度地补充由于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不足。第四,健康老龄化建筑在全民健康、每人一生健康、从小做起、预防为主的基础上。

姚: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我们一个比较普遍的讲法是“走有中国特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之路”。多年来,您也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您认为,究竟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之路?或者说,中国特色应该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邬:中国特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界定。具体到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我认为可以从基础、对策、目标等方面进行阐释。从基础方面看,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社会保障水平低、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尊老传统、家庭养老、政府机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决定了人口老龄化是压力,但又具有减缓压力的有利条件。从对策方面看,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要吸取和采纳其他老龄化国家的经验,又要结合我国实际,利用各种资源,构建

一个覆盖面广、多层次、多渠道的社会养老助老保障网。这就是,家庭养老与社会助老相结合、尊老敬老传统与法制建设相结合、政治思想教育与经济保障相结合、社区管理与单位责任相结合,等等。从目标方面看,我国政府提出了“六个老有”的方针,这是一个具体的目标。如果站在老龄社会的角度,我们可以将之归纳为健康的老龄化、安全的老龄化、尊严的老龄化、贡献的老龄化。这四个老龄化将老年人的需求、老年群体的需求和老龄社会的需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社会、群体、个体利益的统一,也保证了政治、经济、环境、心理、生理的统一。

姚:最后,我还想请您对人口学和社会老年学发展前景谈谈看法,也想请您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年轻学者讲几句话。

邬:尽管我们搞了几十年人口学,但是,人口学的真正价值并未被人们所认识。这是人口学始终是潜学科而不是显学科的根本原因。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因素渗透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无论我们思考什么问题,都离不开对人口问题的思考。所以,如何认识我国的人口国情,并不能仅仅满足于计划生育的阶段,而应该像认识提高全民人口素质、经济发展问题、环境退化问题、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一样,具有历史的观点、全局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老年学的发展,也具有同样的特点。一方面要研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方案,另一方面要加强老年学学科的建设。中国人口学和老年学学科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道远。我希望一切有志于人口学和老年学研究的年轻学者,能够脚踏实地、不务虚名,认真研究一点中国的东西,为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和学科体系贡献力量。

(本文责任编辑: 朱 犁)